

我和我的祖国 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

驻守在喀喇昆仑之巅的日子

■本报特约记者 王雪振

晚点名即将开始的时候,纷纷扬扬的雪花毫无征兆地落下来,无声地洒进队列。

我站在队列前,望着一张张在风雪中冻得通红的脸,他们是那么阳光自信,那么朝气蓬勃。霎时间,我的心头涌起了无限感动,眼泪也瞬间溢出眼眶。

7年前,我从南开大学毕业,选择投身南疆军营。这7年在边疆营盘的日子,给了我很多很多难忘的记忆,挫折和无奈同在,进取与收获共舞。突然在战

友们面前情绪失控,却只有这一次。仔细想想,不是因为担负的任务有多么繁重,也不是高原环境有多么艰苦,更不是承受的压力有多么巨大,而是驻守喀喇昆仑山之后,连队的每个人都带给我太多太多的触动。

来到雪域高原的这些日子里,低温、干燥、缺氧一直在折磨着大家;有的战友鼻孔出血,口腔干燥睡不着觉,干裂的嘴唇起满了泡;有的战友刚上来便出现高原反应,呼吸困难,头痛难忍,四肢乏力,

心率加快;有的战友因劳累过度,一吃饭就吐,靠喝水维持生理机能;还有的战友头发脱落,皮肤皴裂,太阳一照便刺痒难耐……

在这样的环境下,作为指导员,我曾一度担心连队的官兵可能撑不下去。但事实证明,我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。

我见证,工程师张新强强忍头痛,背着便携氧气瓶在阵地抢修装备;

我见证,班长钱双喜为了完成演练任务,胃痛发作仍坚守岗位,直到强行送他下山的前一天;

我见证,上等兵王佳馨每次演练完归还炮弹,仍按照领取弹药时全力冲刺,为的是多体验一遍、适应一次……

望着他们的身影,我蓦然发现,其实,他们中最年长的不过30出头,最小的才刚满18岁。他们也是新时代的年轻

人,也喜欢熬夜玩游戏,喜欢到时尚的餐馆里“打卡”,还喜欢穿着酷酷的摆出胜利的手势,以自拍的方式诠释“诗和远方”……

可是,因为这身军装,他们从热闹中走出来,到了这喀喇昆仑之巅,默默地将自己的担子奋力扛起,没有抱怨,从不气馁。

他们,是一群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使

命的人。感动于他们的奉献,感动于他们的可爱,我想以拙笔将这些日子记录下来。

我想,这段驻守喀喇昆仑之巅的日子,是属于我们共有的“光辉岁月”。

记者手记

那里有我们的光辉岁月

■本报特约记者 王雪振 黄宗兴



第535期

特稿

如果不是当兵,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来这里

这里是中国西北边境一处再普通不过的驻军点。高炮连像楔子一样,牢牢钉入这个喀喇昆仑雪山包围的谷地。

这里的自然环境是如此恶劣:大气压只及海平面的61%;空气中的氧气含量比平原地区少一半,紫外线辐射的强度却比一般平原地区高50%;终年严寒积雪,所谓夏季,气温也常常在零摄氏度以下,昼夜最大温差甚至超过30摄氏度……

尽管如此,在中国雄伟壮阔的版图上,这片“不毛之地”不可或缺。上世纪60年代,高炮连的前辈们曾在此浴血奋战,赢得了胜利。在驻军点附近的高地上,历经岁月打磨的工事,仍然静矗立。

高炮连的一名下士,一直痴迷于军事题材小说《士兵突击》。随部队驻扎于此后,他就觉得,现在的营地与小说中红三连五班所守卫的地方,有着异曲同工之处——都是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
“如果不是当兵,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来这里。”这个名叫马步忠的下士说。

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寒极地。如果以高炮连所在的地域为原点,要走很远的山路,才能找到一个像模像样的城镇聚居地。大片的无人区如汹涌的汪洋,包裹着高炮连的营地,好像随时都能将它吞噬殆尽。

高炮连到此驻扎时,这里已经有了一条通向外界的搓板路。首先,这里只有车辙印。后来,车辙印被反复碾压加固,还掺进了石子,升级成了一条路。

虽然牵引车辆动力十足,但坐在车里的高炮连官兵来回翻滚,犹如热锅中的炒豆,被颠簸戏耍得头晕目眩,吃尽苦头。

高炮连连长苏博康,有着丰富的野外行军经验。在这条路上,他却丝毫不敢大意。循环往复的回头弯,相似的山头,很容易让人产生“路总走不到头”的错觉。他反复对照行军地图,寻找让自己放心的地貌地物,以确认行军方向。

通向高炮连营地的这条路,铺满了辛酸、或痛苦的记忆。在苏博康的印象里,有个为连队运送补给的地方司机,曾贡献了最富戏剧性的一幕。开车到达营地后,那位司机几近崩溃,一边痛骂这条路,一边嚷嚷着:“即使给十万块钱,也不会再来这个鬼地方!”

“我们似乎与社会存在着某种脱节。”苏博康相信,正是因为这种脱节,他们保卫的那些人们才有了更多的选择。

早饭的准备,从凿冰、破冰开始

对高炮连的官兵来说,种种境况和遭遇,都在一次次告知他们,这是真正的苦寒之地。

作为防空兵,高炮连的官兵已经习

惯了眼里天天有狼烟。在相对安静的日子里,他们更愿意为烽火杀戮赋予一些浪漫主义味道——白天看云彩,晚上数星星。

不过,高炮连所在的地方,还是充斥着冰冷的现实。一只叫小白的狗,成了他们共同的悲伤之忆。

小白,是一只出生在海拔4200米兵站中的高原狗。得知高炮连要到更高的地方戍守,兵站的战士把它送给了连队。到了营地,小白不吃不喝。打营养液、吸氧,种种法子都用过后,还是没能阻止它生命的终结。

小白死后,高炮连的驻地又多了一个新的称谓——狗都养不活的地方。小白的死,也让高炮连的热血男儿们,多了几分对自然的敬畏。他们走路不再火急火燎,说话变得和风细雨,增减衣物不再随心所欲,为预防雪盲症,墨镜也成为必备之物。

新时代的年轻人多有智能手机依赖症。起初,归零的信号让这些年轻官兵无所适从。为了能够找到和亲友联通的信号,每到周末,他们会分批乘车跋涉几十公里,赶到边防连附近,只为打个电话。

这段路途,也成了不少人刻骨铭心的回忆。一次,因为山路过于颠簸,列兵梁树忍忍不住在车里呕吐了。污秽物直接洒落在下士鲁寒的脸上、身上,而后便引发了整个车厢里的连锁反应。

高炮连的营地条件有限,官兵居住在帐篷里,厕所是露天的。他们大多选择在温度较高的中午上厕所。如果晚上去,往往要反复蹲下、起来好几次才能最终成功。虽然蹲下起来很麻烦,但能防止下半身被严寒冻伤。

上高原之前,忌惮于高原强烈的紫外线,下士黄易曾托人买了200片面膜,以备不时之需。后来,他才发现,高原的紫外线根本不会给人任何反应时间。到达营地的第二天,黄易的脸,嘴唇便开始皴裂,敷面膜也没有任何好转。

为防止感冒引起可怕的肺水肿、脑水肿等高原病,“不准在早晚时间洗头”甚至成为一道命令。中士陈永鑫因在晚上洗头,受到了连队严厉批评。

陈永鑫一直在炊事班工作,炒得一手好菜。到达高原营地后,所有物资都

是从600公里外运送过来的,运输过程十分艰辛。他明白,“每一粒米都来之不易”。

作为山里长大的孩子,陈永鑫不怕吃苦。然而,在高原上做饭的过程,带给他深入骨髓的痛彻体验。

早饭的准备,从凿冰、破冰开始。冰凉的水,咬得他的手成了连队最早长上冻疮的。冻疮加冰水,反反复复,每次做饭,都犹如过关,苦不堪言。

陈永鑫还记得,有个来炊事班帮厨的列兵,一边在冰水里洗菜一边掉眼泪:“比起受这罪,我宁愿去阵地上扛炮弹。”

这个岁数的年轻人,在山下本来不会考虑生死

说真的,到阵地上扛炮弹,其实不比炊事班轻松多少。

鲁寒17岁就来到高炮连,经过5年的摔打磨炼,已经成为炮班班长。阵地构筑、伪装防护、射击准备等本领,他已驾轻就熟。

来到高原后,第一次实兵拉动,鲁寒觉得自己差点“牺牲”在奔向阵地的路上,“像是被人勒住了脖子,三步一喘,心肺突突的都快炸了。”

鲁寒的负重还算轻的。跑向阵地时,他只需手拿指挥旗,带齐战斗装具,径直越过交通壕,奔向指挥位置。

最痛苦的当属四炮手王佳馨。接到敌情预警后,穿戴战斗装具,迅速赶到弹药室领取弹药,然后负重、跃进,赶在油机与火炮联动前,将弹药压进弹箱……整个过程必须在几分钟之内完成。

刚开始,王佳馨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首次演练,这个19岁的小伙子完成规定动作后便瘫倒在阵地上,许久没有起来。

这个岁数的年轻人,在山下本来不会考虑生死。可到高原后,每次演练时,这个带点残酷和悲壮的命题都会在王佳馨脑海里闪过——他怕自己稀里糊涂就

猝死在阵地。好几次,他甚至都想好了遗书的内容。

历经无数次演练后,王佳馨的心肺终于逐渐适应了高原,跑得也越来越快,所有动作都能在规定时间内干净利落地完成。

和王佳馨的关注点不同,下士田佳奇最担心的是雷达能否迅速启动。他是连队历史上最年轻的雷达站站长,掌管着一部炮瞄雷达。全连火炮处于自动射击状态时,这部雷达便是整个火力单元的心脏和眼睛。

在高炮连所有装备中,雷达差不多是最娇气的。高炮连为雷达构筑的阵地,距离营区最近,可每次雷达开机准备的时间却最长。雷达开机时需要预热,而阵地高寒缺氧,气压极低。

转移一次阵地,能活脱脱扒掉官兵几层皮。接到指令,四级军士长朱军伟会迅速指挥疏散隐蔽的车辆发动,出动,从四面八方进入各阵地,完成各类装备的火速挂载。

从挂载到收拾阵地,战斗班人员没有任何的喘息之机。因为又累又急,总会有人被牵引车辆的油烟熏得呕吐不止。

在朱军伟眼里,挂载转移还不是最累的,转移至预备阵地后,才是魔鬼历程的开始。此时,战斗班人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,重新挖工事、拉伪装、进行射击准备。运气好,能避开冻土层,一锹就是一锹;运气差,一锹下去只能见一个白点,干着急。

下士程欢的手,就是在转移阵地时挤伤的。时间不等人。一个不小心,他的手指就被夹在了两个装备中间,指甲当场掉了,指肚也变了形。事后,程欢欢觉得自己运气不算差,“如果夹的是整个手掌,那才叫完了。”

我们守在这里,不是光吃苦不干事的

演练结束,连队命令所有官兵回到



驻守在喀喇昆仑之巅的日子,是属于新疆军区某团高炮连所有官兵的“光辉岁月”。

冯峻摄

帐篷,燃起火炉,更换衣物。这么做是为了预防感冒。

在反复进行的高原寒区防病教育中,大家明白,在高原上一旦感冒会引发急性肺水肿、脑水肿,若救治不及时,都会要人命。

漫长的守防岁月里,曾有战士因患突发脑水肿而牺牲的先例。战友们一面深情缅怀他,一面警醒自身,防止非战斗减员。

回到温暖的帐篷,列兵梁树业有种重回人世的错觉。坐在凳子上安静休养的时间里,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气在一点点增长,灵魂仿佛也在一点点地归窍。

那时,倘若再有其他安排,他全身的痛苦感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。

一个庞大的工作组曾风尘仆仆赶到高炮连驻地,来考核评估连队的军事训练水平。到达营地后,他们一下车就紧紧握住了官兵的手,连声说不容易,“能守在这里就不容易。”

可高炮连的官兵,并不想通过所谓的艰苦博取同情。相反,他们想牢牢抓住这次考核评估机会,“用连队的战斗力告诉大家,我们守在这里,不是光吃苦不干事的。”

当天,风裹着鹅毛大雪扑向阵地。考核按计划开展。面对考核组设置的情况,连队官兵迅即出动,比规定时间提前40秒完成了战斗准备。等到考核结束,一个个变成雪人的战士,军姿依然挺直,斗志始终旺盛。

最终,高炮连顺利通过考核,军事训练获得优秀,战斗作风也得到了高度肯定。工作组临走时,不停地说了:“你们真是好样的,真是好样的!”

这片高天净土,承载着很多重要的人生课题

如果抱着旅游的心态,来看高炮连驻守的地方,简直别有一番景致——雪山下,棕熊、狼、狐狸、黄羊不时出

没,罕见的苔藓类植物开出小小的花;五颜六色的玛瑙石遍地都是,一颗颗镶嵌在风化的地表上;夜幕来临,密密麻麻的星星悬挂在碧蓝的穹顶上,银河如玉带一般,惹人尖叫……

对高炮连所有人而言,他们守卫的这片高天净土,既是绝佳的梦中远方,也承载着很多重要的人生课题。

在连队,最激动人心的活动莫过于升国旗。每当国旗在高原徐徐升起时,大家的军姿、军礼总是最硬挺的。他们的眼神里、嘴角上,带着无法掩饰的激动。

大学生士兵刘万珍说:“到了这里,才更鲜明地感受到,什么是我与祖国同呼吸、共命运。”

在他眼里,升国旗的时候,没有谁会在意自己的军人形象。就连平时总是嘻嘻哈哈的下士黄易,军礼都敬得比平时好。

参军之前,黄易曾在工地上当过3年小工,和泥、粉刷、装修……工地转换间,他的身影跟随工友在城市化浪潮中此起彼伏。站在高高的毛坯楼上,城市的喧嚣从耳畔呼啸而过,城市的繁华涌入眼中。“那时候,总想着生命的价值是什么,自己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。”黄易说。

当兵,成了黄易的自救救赎。丰富的阅历,让他显得更加成熟。唯一的不足,就是黄易作风稍显稀拉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他操作雷达时的专注。

高炮连的官兵来自全国12个省份,5个民族。如果不是从军,他们会被裹挟入现代化建设的大潮,在经济社会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。

有的出于从军报国的崇高,有的着眼谋求出路现实,他们怀揣五花八门的动机,从五湖四海汇聚到高炮连所在的营盘。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军营的修剪,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凝成战斗的共同体而挥汗如雨。

显然,正向的变化占了优势——刘万珍觉得,自己与家人的联系更加紧密,可聊的话题越来越多;陈永鑫利用积攒的工资买了房,虽然他还没对象;在田佳奇眼里,自己不再是那个羞于说话的傻小子,经过部队的历练,他的本领越来越多,有了应对未来挑战的底气……

苏博康明显感受到,自从连队来到海拔地区驻防后,人与人的依存度明显提高,啥事儿都喜欢一起干、比着干。“条件艰苦,抱团取暖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。”他说。

一年一度的士兵留队意愿摸底,在高炮连悄然进行着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这样的铁律终究没人能打破。

所有人都知道,兵也好,官也罢,没有谁能成为军营的永久主人。迟早大家都会和高炮连说再见。

今年,高炮连有3名士官和5名上等兵计划离开。他们将重新汇入社会生活,或步入工厂,或做些买卖,或重回校园继续学业。炮班班长鲁寒就是要走的8个人之一。出于家庭考虑,他决定退役。

但是,真要离开高炮连,大家心里的纠结却越来越强烈。鲁寒已经做好打算:等自己的孩子长到12岁,就带着他从湖北老家出发,重走一次从军路,来看看高炮连现在驻守的这个地方。

当鲁寒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的时候,家里人问他:“那么苦的地方,还回去干啥?”鲁寒也不确定自己这个想法是不是一时兴起。但当他想到答案时,突然有了豪迈的感觉。

他的答案是:因为,那里有我们的光辉岁月。

版式设计:梁晨